

◎中国经典作家在海外

沈从文：

乡土文学在法语世界的文化之旅

丁 濛

沈从文被《世界报》《新观察家》等多家法国主流媒体誉为“中国最伟大的作家之一”。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走进法语世界，此后经历低潮期、破冰期与发展期，沈从文的作品令法语读者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乡土中国。

法国作为世界汉学研究重镇，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接受较晚且进程相对缓慢，巴黎第三大学教授张寅德指出，其中一个最重要原因就是中国古典文学在法国取得了巨大成功，导致法语读者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忽视。多年来，正是传教士、汉学家、翻译家等的持续关注，沈从文在法国的译研工作才不断取得新突破，不仅文本选择更加丰富，研究领域进一步拓宽，其影响还扩散到除法国以外的比利时、加拿大等讲法语的地区。

从“二流作家”到“中国文学大师”

1932年，沈从文作品的第一个法文译本，也是第一个外文译本诞生。该译本包括沈从文早期创作的5篇短篇小说《乾生的爱》《蜜柑》《雨后》《中年》《有学问的人》，都由张天翼翻译而成，最初分别刊载于法语插图杂志《北京政闻报》，后由北京政闻报出版社集出版。

张天翼的译作虽开启了沈从文在法语世界的传播之路，但此后的几十年间，沈从文都未在法语世界引起太大关注。究其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文本的选择不具有代表性。西方读者阅读中国小说往往将其视为了解中国“最有效生动的媒介，最直接的窗口”，文本的选择应契合时代语境和读者预期。其次，这一时期法语世界对沈从文的评价存在一定偏见。1946年比利时传教士文宝峰出版《新文学运动史》，这也是第一部用法文撰写的与中国现代文学相关的专著，他虽然对沈从文作品的文学性赞赏有加，但却认为沈从文只能算同时代作家中的“二流作家”。1953年，法国耶稣会士明希礼在专著《中国现代文学概要》中，用短短一章简单介绍了沈从文，称其虽为“中国地域文学的创立者之一”，但并不能被归入伟大作家之列。

改革开放前后，沈从文作品在法语世界的传播取得突破性进展。首先是，官方外宣活动加快了其走向世界的步伐。1980年至1993年，《中国文学》发表了包括《边城》《丈夫》《知识》等在内的6篇沈从文作品法文译文。1982年，中国文学外译项目“熊猫丛书”出版法文版《沈从文小说集》，收录了《边城》在内的多篇中短篇小说。因选取的文本具有代表性和译文质量高，受到法语读者的追捧。

其次，彼时的西方读者也迫切渴望通过各类作品了解中国社会，法语译者对沈从文的翻译热情空前高涨。1987年，法国汉学家赫美丽主编的《十三篇中国小说（1918—1949）》选取了包括沈从文在内的“通过创造新的文学，为中国社会的转型作出贡献”的9位“中国文学大师”的代表作品。该书受到法语读者喜爱，2000年被菲利普·毕吉耶出版社再版。

这期间巴黎东方语言文化学院教授何碧玉对沈从文作品在法国的译介与传播作出了巨大贡献。巴黎第七大学教授保尔·

巴蒂认为：她的翻译填补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在法国的空白。何碧云的突出贡献在于，其译文覆盖的体裁非常丰富，既有以《边城》为代表的中篇小说，也有《水云》《湘行散记》这样的散文集，还有《萧萧》《静》《柏子》等短篇小说。其次，她选取的都是沈从文的代表作，不仅从文学性上契合西方读者的审美意趣，且通过这些作品构建了一个更加立体的中国作家形象。何碧云翻译的《从文自传》尤其受到法国读者喜爱，1998年由阿尔宾·米歇尔出版社重新出版。《世界报》发文盛赞作品意境优美，富有感染力，是更接近中国古典文学的山水散文。可以说，正是得益于何碧玉等翻译家勤勉不辍的工作，沈从文的作品才得以真正“扬帆出海”，在法国广为人知。

进入新世纪以来，“沈从文热”并未消退，法国翻译家杜碧姬创建的网站“当代华文短篇小说”、汉学家贝特朗·米亚拉雷创建的“中国书评网”等一直在更新与沈从文相关的法文译文与评论文章，对沈从文在当代法国的传播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从“乡土作家”到“世界文学对话”

沈从文作品在法语世界的早期译介与传播进程中，乡土文化认同起到了重要作用，也有学者提出，沈从文的作品仅限于乡村生活，例如文宝峰虽赞叹沈从文丰富的想象力，但认为沈从文眼界的狭隘导致他缺乏思想、理论浅薄。1990年，何碧玉在《边城》译著的后记中率先提出，以“乡土文学”定义沈从文过于简单。进入20世纪90年代，沈从文作品的法译工作进入繁盛期，带动了法语世界的沈从文研究，相关成果呈现出论点更新、视角更广、方法更多的特点。

其一，从文学与图像的互动角度探讨沈从文作品的东方传统美学。1992年，何碧玉在《从文自传》译著后记中表示，沈从文的文章植根于中国传统，他的文字承载了中国古典画的美学特质，恰是“诗是无形画”的完美呈现。张寅德、保尔·巴蒂、安妮·居里安等都从美学角度挖掘沈从文作品的艺术价值，认为沈从文是一位将文学与绘画融为一体的艺术家。

其二，运用新历史主义理论、女性主义理论等还原沈从文的创作背景，阐释其作品的社会价值和政治意蕴。1992年，何碧玉在博士论文《沈从文的文学创作：从历史的审判到小说的道歉》里认为，沈从文的“田园牧歌”式创作源于对现实的规避。杜碧姬的《沈从文作品中的暴力书写》分析了沈从文书写的暴力动因与人文精神。1997年，来自意大利的焦石在他的法语博士论文里对此提出疑问：文学作品的政治动因是否必须成为评价文学经典性的前提条件？他认为，不对沈从文作品进行过分政治性的解读。2013年，焦石在云南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轻盈地掠过现代性的泥淖——沈从文小说中的反讽意象和异域情调》也是以此博士论文为基础。

其三，从比较文学视角寻求沈从文作品与世界文学融合对话的可能性。新世纪以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将沈从文置于更广



阔的文学语境中进行考察，挖掘其与世界文学潮流的互动。沈从文被海外研究者称为“中国的福克纳”“中国的普鲁斯特”，是一位既保持中国传统，同时又能引发世界共鸣的经典作家。2000年，何碧玉在专著《京派与海派：近三十年来中国文学里的传统与现代》中探讨了京派作家沈从文与西方文学之间的互动关系。杜碧姬将沈从文的文章植根于中国传统，他的文字承载了中国古典画的美学特质，恰是“诗是无形画”的完美呈现。张寅德、保尔·巴蒂、安妮·居里安等都从美学角度挖掘沈从文作品的艺术价值，认为沈从文是一位将文学与绘画融为一体的艺术家。

其二，运用新历史主义理论、女性主义理论等还原沈从文的创作背景，阐释其作品的社会价值和政治意蕴。1992年，何碧玉在博士论文《沈从文的文学创作：从历史的审判到小说的道歉》里认为，沈从文的“田园牧歌”式创作源于对现实的规避。杜碧姬的《沈从文作品中的暴力书写》分析了沈从文书写的暴力动因与人文精神。1997年，来自意大利的焦石在他的法语博士论文里对此提出疑问：文学作品的政治动因是否必须成为评价文学经典性的前提条件？他认为，不对沈从文作品进行过分政治性的解读。2013年，焦石在云南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轻盈地掠过现代性的泥淖——沈从文小说中的反讽意象和异域情调》也是以此博士论文为基础。

其三，从比较文学视角寻求沈从文作品与世界文学融合对话的可能性。新世纪以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将沈从文置于更广

多元途径拓宽海外传播渠道

法语世界的学者们通过文本译介、文学研究等方式搭建起中国文学与世界读者的沟通桥梁。全球化语境下，各界人士也在不断探索沈从文作品进一步经典化的传播契机。

跨媒介改编扩大受众范围。随着新兴媒介兴起，文学的影视改编进一步强化了沈从文作品的经典地位。1985年，凌子风导演的《边城》获得第九届加拿大蒙特利尔国际电影节评委会荣誉奖，获奖理由是“电影画面相当美丽，令人愉悦，思想具有深度”，而相较于《边城》，法国观众似乎对谢飞执导的电影《湘女萧萧》更加情有独钟。1987年，该片入围戛纳电影节“一种关注”单元，1988年在法国蒙彼利埃电影节获得“金熊猫奖”，在法国引起热烈反响。2017年，影片在比利时的法语布鲁塞尔自由大学放映，经典影片进课堂的活动进一步拓展了文学受众群体。2020年，作为法国尼姆中国电影节的开幕电影，《湘女萧萧》再次获得广泛关注。2021年，法国拉罗谢尔孔子学院举办的第八届“中国电影周”也放映了该影片，会议结束后主办方还举办了沈从文翻译研讨会，参会人员包括来自意大利、法国等多个国家的汉学家、翻译家，生动诠释了文学与影视相互成就的联动关系。

国际学术交流日益频繁。2020年，巴黎中国文化中心读书俱乐部举办第三期文学沙龙活动，20多位来自法国的中国文学爱好者聚焦作家沈从文，围绕其代表作《边城》《从文自传》和《水云》展开热烈讨论。2018年，何碧玉参加了广西大学外国语学院举办的主题为“沈从文小说的翻译及其在法国的接受”的讲座。2024年，她再次与中国师生见面，在浙江大学外国语学院围绕“中国现当代文学在法国的译介”进行了分享。学院内外的沈从文作品阅读与交流活动，进一步拉近了海内外读者、研究者与沈从文作品的距离，为文学经典的当代传播注入新的活力，也扩大了中国文学的读者圈。

沈从文在法语世界的经典化历程是中国现当代文学走向世界的重要案例。文本选择的经典性、研究角度的多样性、传播方式的丰富性等因素在其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对于海外中国文学经典的当代建构具有启示意义。

（作者单位：南通大学外国语学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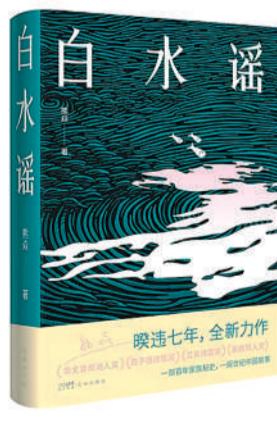
篇布局上体现出匠心与从容，枝蔓繁多的历史线条通过倒叙、插叙等手法表现出清晰可循的逻辑链条，又充满岁月人生的纵深感，呈现出复调结构。在历史事件的选择上，借由三位叙述者的视角，偏重于展示三个大的历史时段。重要的历史时刻往往以寥寥数笔勾勒清楚，以简洁笔法交代其背景，在最需要展现人性复杂的地方则进行详细叙述，铺排人生行迹。作者利用典型场景写历史，尽可能隐去主观性，以详略得当和删繁就简的笔法展示历史的面目。这样的叙事既能挺立起小说的骨架，让历史之屋有了坚固的四梁八柱，同时又有着丰盈的细节，让读者可触可感。

熊焱曾在接受采访时说，“我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向往与追求彼岸那一抹微微闪烁的光亮。”《白水谣》的写作，显示出作家向着隐秘的人性世界进发的雄心，他力图通过探寻百余年家族沧桑变化中生命个体的心灵境遇，呈现个人挣扎与社会现实、家族命运与时代潮流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小说结尾，到了这个家族的第六代、第七代人物，他们生活的环境已不再像祖上那么波诡云谲，而是充满着祥和与安宁，温暖的叙事色调，有一种历尽沧桑的开阔与澄明。熊焱的写作既是一次向着幽深历史的回眸，也是一曲普通个体在时间长河中奔腾奋斗的赞歌。

现实的文学世界。《白水谣》分别以家族的第四代杨浩、第三代王秀莲、第六代杨希望为主角，通过他们的讲述，为这个家族串联起一条绵延不绝的历史脉络。七代人的命运映衬着百余年来中国历史的多个重要事件和转折时刻，折射出大时代的沧桑巨变。小说线索复杂，人物众多，个体的成长史如一朵朵细浪，消融于时代的波澜壮阔中。但缜密而细致的叙事，让人物的性格成长与命运流变有迹可循，在多个部分的互文叙事中形成完整闭环，体现了作家对小说复杂结构的把控能力。

历史是一条永不停歇的河流，但历史之中的人性，却有其恒定不变的一面。

《白水谣》中的老太太是家族第一代，参与了家族财富的积累。她在青年时代便失去丈夫，数十年守寡，独自拉扯儿子杨振华长大，内心如一口深不见底的古井，只有与童年的王秀莲交流时才可见温情与慈爱。杨振华的两位夫人丁翠英和张蕾为了让各自的儿子获得家族产业继承权，无所



以家族史视角书写百年风云

——读熊焱长篇小说《白水谣》

杨荣昌

个人史与家族史是构成小说中宏大历史叙述的基本单元，可以有效弥补主题意旨的概念化或文学形象的空疏化，形塑一种更加真实的肉身状态，建构可亲可近、可信可感的历史小说叙事。熊焱的长篇小说《白水谣》（花城出版社）正是一部力图走进历史深处、呈现人的精神境遇的作品。该书通过三位主人公的第一人称口吻，讲述了一个家族上溯清末、下讫新世纪第一个十年共七代人的家族史。

许多当代作家热衷选择历史题材进行文学创作，因为在巨大的时空容器中，可以尽情发挥虚构的才华，建构一个有别于

不用其极。小说以丝丝入扣的叙事，将旧社会的家族闺阁斗争写得惊心动魄，爱恨情仇的纠缠写出人性的幽深与复杂。

小说体现了作家对极致叙事的追求，从两个维度可看出这种努力。一方面是以死亡叙事凸显人物在劫难中的忍受力，显示出人生命运之无常。在这其中，王秀莲是贯穿家族史的重要人物，见证了家族在历史洪流中的沉浮与兴衰，面对亲人一个个离世，她以强大的隐忍、包容、宽厚，成为家族繁衍生息的精神支柱，作家在她的身上寄寓了深厚感情。另一方面，作家写出了爱情的力量，凸显了爱情就是一种救赎的认识。小说中多组人物的爱情关系，如杨志强与王秀莲，杨浩与罗小珠，杨希望与傅秋红，杨雨与高小强，无一例外都经历了生活的磨难与淬炼，爱情却愈发坚韧与不屈。这份坚守被作家写得一咏三叹，荡气回肠。

百余年的家族史不仅是七代人的故事，也连接起他们所处的时代。小说在谋

2023年1月27日，著名翻译家李文俊在睡梦中辞世，享年93岁。他留给世界的，除了等身译著，还有穿过历史风雨的从容持守、洁清精神。人们曾用民族的先知，或文化的盗火者，来形容老一辈译者，是他们肩起文化引渡、开荒拓殖的工作，影响了几代中国作家和读者，改写了当代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关系。

“没有人对翻译家的长相感兴趣。”李文俊曾这样形容译者的寂寞，这寂寞里，却有吾道不孤、不改其乐的喜悦。“我的工作就是我的娱乐。我成天与文学巨匠们亲近，直到深夜他（她）们还在向我喃喃低语，与我‘耳鬓厮磨’。”如果我们认真凝视这位翻译巨匠的照片，会发现，从青葱少年到耄耋老者，李文俊眼中的纯萌不改，只增添了岁月留给他的深邃，“嘴角微抿，眼神温和安详，略有悲悯神色”。他的儿媳妇，青年书法家马小起，正是在与这目光的对视中，写下缅怀之书《我的文俊老爸》（上海文艺出版社），作为“我想念老爸爸最好的方式”。痛失亲人后，哀悼文字构成另一幅逝者“缺席”的肖像，供世人长久凝望。

马小起的文字，清澄，简白，性情天真，近乎憨直，在深处却有一股悲恸的热力涌出。书中娓娓道来，从她孤身“北漂”的恓惶不宁，到与患有轻微孤独症的丈夫“傻天使”的相亲，再到嫁入李家，从公婆李文俊、张佩芬手里郑重接过“托孤”之责，成为超越血缘关系的家人。与其说“是老爹为我们选中的彼此”，不如说天使是互相认出，互相选择的，“胜过人间所有能被定义的情感关系，是最牢靠的心灵托付”。他们一起陪伴李文俊度过最后的8年，“敬爱的李文俊先生”渐渐变成了“亲爱的文俊老爸”，滋味绵长，哀乐相随。马小起所写，都是家庭记趣，日常琐忆，从饮食起居的细节，到依偎嬉戏的时刻，直到死神将他们分开的最后一刻。《文心雕龙·哀吊》有言，“情往会悲，文来引泣”。无须刻意渲染哀痛，书中至为感人的，恰是那些平淡温馨的人间真情与真味。

书中的李文俊与张佩芬夫妇，褪去了文化名人的光环，还原为一双羞涩、柔弱，再平凡不过，也再可爱不过的老人。他们的父母心，与世间所有父母无异。在马小起眼里，李文俊活泼、幽默、有趣，是老绅士，更是老顽童。但他几乎从不轻易流露内心的波澜，直到晚年老糊涂了、车轱辘话说不停的时候，才返璞归真般地，回归孩子一样不设防的天然本相。唯有走到了人生之境的边上，一个亲历过动荡年代的知识分子，才会让人瞥见他心底深埋着的一切，无论是对患难见真情的人心寒暖的珍视，还是对是非曲直的固守。“原来小时候拥有的，才会一辈子不缺。”在生命尽头，他切切记挂的，仍是童年、父母、妻儿，让人感叹。马小起手书“从此人间再无李文俊”，有双重的挽悼意味，是对李文俊老爸的告别，也是目送一个文学时代的渐行渐远。挽悼之文，是至情至性的私人独白，是生者与死者跨越不可能的亲密对话，在面向公众时，又有了引起共鸣与人格传递的奇遇意味。

值得记取的是，李文俊的文学翻译之所以为人称道，不独是语言造诣上的才华、韧劲与悟性，更有挑选翻译对象时“引为同类”的惺惺相惜。他在心爱的文学艺术世界里，投射和建构自己的精神意志，“认识自我与洗涤自己灵魂上的污垢”，并照亮了无数他人的精神天地，其中也有马小起。《我的文俊老爸》同样是一个灵魂与另一个灵魂的以心交心，是大写人格的延续、脱胎、新生。我们因此明白，德里达所说的“哀悼的工作”的意义：在与他者的关系产生之初，哀悼就已经被预示，因为总有一方会先行离去。所以，“哀悼的工作”结构性地与爱同在，并非到死亡降临时才发生，而是贯穿于我们与至爱相处的日日夜夜。斯人已逝，但他生前死后留在我们内心的注视，都参与建造、完成着我们的一部分。生命早已公平地将封面摆在每个人面前，我们如何过好这一生，如何面对自身的衰老与死亡、理想与尊严？这样看来，缅怀亲故的读与写，同样可以传递一种创造性的、积极的力量。

李文俊曾写过不少怀念文章，为外国文学翻译界的前辈，为先他离去的同事、老友而作，比如傅雷、萧乾、汝龙、徐迟、钱锺书与杨绛夫妇。他们几乎构成现代翻译史的半壁。如今，他回到他们之中，也在马小起的书中不朽。大概是经过了太多送别，李文俊早已坦然看待死亡的必至，他说：“我们世界上的每一个人，无不都是在‘万物之逆旅’中稍作盘桓，然后终究要回到自己的老家，去和我们先行的亲爱者长相厮守。”这个跨越新旧世纪文学的寂寞旅人，想必已经在世界的渡口，与他所爱的星群重逢。“待我成尘时，你将见我微笑”，无论抬头向夜空致意，或是潜游书海，我们也终会重逢。

（作者单位：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刘欣玥

在世界的渡口，与星群重逢